



宋太祖“以孙为子”考辨

——兼析王继恩等“谋立太祖之孙惟吉”传言

顾宏义

摘要:宋太祖尝将其年幼之孙(即德昭之子)迎入官中抚育,并以孙为子,赐名德雍,与其父叔“联名”。太宗亦疑似存在同样情况。如此抚育皇室幼儿于宫中之事,其初衷似与太祖宋皇后、太宗李皇后未有子嗣相关。但此一“紊乱昭穆”之举,在宋初皇位授受之际产生微妙之影响,故太宗此后遂改德雍名为惟吉,恢复其皇侄孙身份。当太宗驾崩,王继恩等大臣谋阻止真宗继位而未成,但此后遂有其欲“谋立太祖之孙惟吉”之传言流布于世,神宗时与两宋之际分别发生的宗室异动事件,以及高宗选择太祖后裔继位,皆受此传言或显或隐之影响。

关键词:宋太祖;以孙为子;王继恩;赵惟吉

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1-0093-10

古代中国礼制讲究严格的家族成员长幼等级,但又存在“以孙为子”之类紊乱伦理现象^①。此现象不仅行于民间,也存在于皇室之内,如《新唐书·十一宗诸子传》云“德宗十一子,昭德皇后生顺宗皇帝。帝取昭靖太子子谊为第一子,又取顺宗子諲为第六子”^[1]。而《旧唐书·德宗顺宗诸子传》也云“文敬太子諲,顺宗之子。德宗爱之,命为子”^[2]。今有学者据西安新出土的两方唐代亲王墓志,指出唐代蜀王“李傀确系代宗之子,但自幼便被其祖父肃宗收养为子,故其行辈遂与代宗同”^②。此类现象也存在于宋初皇室,宋太祖即尝以其孙为子,太宗亦疑似存在同样情况,但学界对此甚少关注^③。故本文拟就相关史料以探析宋初皇帝以孙为子现象,兼及北宋前期皇子娶妻、公主出嫁之际皇子妃、驸马升行之类皇室内“紊乱昭穆”之事频现之原因,进而讨论此现象对宋初政治之影响,此外兼辨析王继恩等“谋立太祖之孙惟吉”传言的背景。

一、宋初太祖“以孙为子”及其原因

史载太祖生四子,德昭、德芳,又二子早卒。德昭次子惟吉,据《宋史·宗室传》载:

惟吉生甫弥月,太祖命辇至内廷,择二女媪养视之,或中夜号啼,必自起抚抱。……太祖崩,惟吉裁六岁,昼夜哀号,孝章皇后慰谕再三,始进馐粥。太宗即位,犹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兴国八年,始出居东宫,授左监门卫将军,封平阳郡侯,加左骁卫大将军,进封安定郡公。淳化四年,迁左羽林军大将军。至道二年,授阆州观察使。凡邸第供亿,车服赐与,皆与诸王埒,自余王子不得偕也。……惟吉好学,善属文,性至孝。孝章皇后抚养备至,亲为栉沐。咸平初,以太祖、孝章画像、服玩、器用赐惟吉,岁时奠享,哀慕甚至。每诵《诗》至《蓼莪》篇,

收稿日期:2024-10-01

作者简介:顾宏义,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1),主要从事宋史、古典文献学研究。

涕泗交下，宗室推其贤孝。^{[3]8678-8679}

由“太祖崩，惟吉裁六岁”，太祖崩于开宝九年(976年)，故推知惟吉出生于开宝四年(971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十月戊戌，太宗将其长子德崇改名元佐、次子德明改名元佑、第三子德昌改名元休、第四子德严改名元隼、第五子德和改名元杰，同时将“皇侄孙德雍改名惟吉。惟吉，魏懿王子也，太祖甚爱之，视如己子，故与诸叔联名。上即位，犹居禁中，于是出阁，始改名焉”^{[4]555}。魏懿王即德昭。《宋会要辑稿·帝系》亦载惟吉“幼养宫中，太祖视之如子，与诸叔联名德雍。太平兴国八年十月，授右监门卫将军。端拱元年二月，改今名，进左骁卫大将军。至道二年二月，进闾州观察使”^{[5]20}。则德昭之子出生方满月，即为太祖接入宫中养育，“视如己子”，并赐名曰德雍。因太祖开国称帝以后，不欲其弟赵光义、赵廷美诸子与己子有异，遂一视同仁，故其名皆以“德”字排行。“太祖即位后有旨，诸房子并称皇子、皇女。有言恐无差别，上曰：‘犹子即子也。新得天下，便生分别，朕不欲为也。’”^{[6]6}故廷美“长子德恭初除贵州防御使，称皇第四子，与德昭、德芳同，而其长女亦封云阳公主，女婿韩崇业除右卫将军、驸马都尉，循故事也”^{[6]6}。至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夏，廷美“得罪，下诏削其子女封爵，并云德恭、德隆宜称皇侄”^{[6]6}。史载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二月，“以皇子德恭为贵州防御使，齐王廷美之长子也”^{[4]444}。所授之官同于德昭、德芳。即德昭、德芳分别于乾德二年(964年)六月、开宝九年三月授贵州防御使^④。由此可知，德昭之子为太祖所养育，“视如己子”，并赐名德雍，“与诸叔联名”者，其实乃指太祖实以其孙为己子也。

据《宋太宗皇帝实录》载，太平兴国八年十月戊戌，太宗诏改德崇等五子之名的同时，并诏“皇侄孙文雍改名惟吉，文治改名惟正，文起改名惟忠，文宸改名惟贞”^{[7]59}。检《宋史·宗室传》称德昭有五子，惟正、惟吉、惟和三人皆未云其曾经改名，然又称惟固“本名元宸，太平兴国八年，改赐名，授左千牛卫将军”；惟忠“初名文起，太平兴国八年赐今名，授右千牛卫将军”^⑤。又《宋太宗皇帝实录》载端拱元年(988年)二月，

“以皇侄孙惟吉为左骁卫大将军，惟正为右骁卫大将军”^{[7]562}。至道二年(996年)二月庚辰，“以皇侄孙左羽林大将军惟吉领闾州观察使，故魏王德昭之长子也”^⑥。

太祖养育德昭幼子于宫中，并又以孙为子，似当与太祖皇后宋氏有关。

据《宋史·后妃传》，太祖于开宝元年(968年)二月“纳(宋氏)入宫为皇后，年十七”^{[3]8608}。检诸史籍皆未载宋皇后尝生育子嗣，故疑太祖乃因宋皇后无子之故，遂将皇室幼儿接入宫中交宋皇后抚育。据《宋史·宗室传》，太祖、宋皇后于将惟吉“幼养宫中”之稍前，约开宝初，廷美子德彝，被“太祖召鞠于宫中”^{[3]8673}。因德彝“大中祥符八年卒，年四十九”^{[3]8673}，则其当生于乾德五年(967年)。又《宋史·真宗本纪》载开封尹赵光义第三子(即真宗)开宝元年“十二月二日生于开封府第。……幼英睿，姿表特异，与诸王嬉戏，好作战阵之状，自称元帅。太祖爱之，育于宫中。尝登万岁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3]103}。据《宋史·宗室传》，真宗因次子祐“生九年而薨，追封周王”^{[3]8707}，故“以绿车旄节迎(其弟元份子允让)养于禁中。仁宗生，用箫韶部乐送还邸”^{[3]8708}。而后“仁宗在位久无子，乃以王(允让)第十三子宗实为皇子”^{[3]8708}。而《宋史·英宗本纪》云宗实“四岁，仁宗养于内。宝元二年，豫王(仁宗子)生，乃归濮邸”^{[3]253}。故太祖迎皇室幼儿使宋皇后养育，其意当也是欲于宋皇后生皇子以后将迎养诸儿送归。只是惟吉“幼养宫中，太祖视之如子，与诸叔联名德雍”，即养孙作子，并赐名德雍^⑦，而与其他幼儿不同。至太平兴国七年中，廷美“得罪”遭贬斥，太宗为示己子与太祖、廷美之子的区别，遂于太平兴国八年将自己儿子之名的“德”字改作“元”；并因德雍出阁，享用“凡邸第供亿，车服赐与，皆与诸王埒，自余王子不得偕也”之待遇，即其待遇仍同于诸叔，而高于其兄弟辈，直至端拱元年方改名惟吉，从而取消其为太祖之子的资格，恢复其为德昭之子的身份，即变“皇子”为“皇侄孙”。因此，《宋太宗皇帝实录》云太平兴国八年遂诏“皇侄孙文雍改名惟吉”，似是修《实录》史臣有意将端拱元年改名之事移至此。《长编》称德雍改名惟吉在太平兴国八年中，当是承袭

《宋太宗皇帝实录》之说,《宋史·宗室传》则有意回避惟吉曾名德雍而“与诸叔联名”一节。

此外,《宋史·宗室传》又载太宗长孙、元佐长子允升“初免乳,养明德太后宫,太后亲抚视之。元佐有疾,允升始出第。真宗赐名元中,授右监门卫将军,更赐今名”^{[3]8695}。《宋会要辑稿·帝系》载允升“魏王元佐子。幼养宫中,明德皇后抚视之,及魏王疾,方出外第。至道三年四月,赐名允中,授右监门卫将军。咸平三年十一月,改今名”^{[5]22}。明德太后即太宗明德李皇后,太平兴国初入宫,“雍熙元年十二月,诏立为皇后。……尝生皇子,不育”^{[3]8610}。真宗继位,“至道三年四月,尊后为皇太后”^{[3]8610}。而所谓“元佐有疾”,乃指秦王廷美贬斥“迁涪陵,元佐独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发狂”^{[3]8694}。至雍熙二年(985年)重阳日“内宴”,因未被邀,元佐“遂发忿,被酒,夜纵火焚宫”^{[3]8694},故被“废为庶人”。因元佐有允升、允言、允成三子,至道三年(997年)四月,允言、允成皆授右千牛卫将军^⑧,而未记载其尝有赐名、改名之事。而且太宗之孙以“允”字为名,则允升也不当至此时方赐名“允中”。故疑真宗所赐名当以“元中”为是,且由此也与其叔父“联名”,如此则被明德李皇后“亲抚视之”之允升,似亦是以孙为子,同于惟吉,故真宗有赐名“元中”之举。而“初免乳”的允升被养育于宫中,当与李皇后“尝生皇子,不育”,即未尝有子嗣相关,大略与太祖宋皇后的情况类同。

二、宋太祖“以孙为子”之政治影响

因唐五代社会风气颇受“胡风”影响,社会上普遍存在以孙为子、养弟为儿、收养假子等现象^⑨。在宋初,皇室内“紊乱昭穆”之事,除以孙为子以外,尚有皇子娶妇、公主出嫁之际皇子妃、驸马升行等现象。如柴宗庆之祖柴禹锡,拜镇宁军节度使,父宗亮,官太子中舍。“宗庆尚太宗女鲁国长公主,升其行为禹锡子,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3]13555-13556}李遵勖为李崇矩孙、李继昌子,“大中祥符间,召对便殿,尚万寿长公主。初名勖,帝益‘遵’字,升其行为崇矩子。授左龙武将军、驸马都尉”^{[3]13568}。即“旧制选尚者降其父为兄弟行”^{[3]8774}。不但大臣之子娶公主将升其辈分与其

父等,而且大臣之女嫁皇子也往往存在升行现象。如《宋史·后妃传》载真宗章怀潘皇后为忠武军节度使潘美“第八女。真宗在韩邸,太宗为聘之,封莒国夫人”^{[3]8611}。然《宋史·潘美传》却称潘美子惟熙“娶秦王女”^{[3]8993},而“惟熙女,即章怀皇后也”^⑩。又如太祖子德芳娶知河南府焦继勋女^⑪。然据《焦守吉墓志铭》《宋故宜春县主赵氏墓志铭》,“联姻帝室”者似为焦继勋之孙女,为平衡“赵匡胤与焦继勋君臣之间的行辈”,遂将焦继勋之孙女升行,以嫁太祖子德芳^⑫。诸如此类驸马、皇子妇升行现象,当与调整其姻亲之行辈差等有关^⑬。虽然同属“紊乱昭穆”,但作为皇子,其身份显然不同于公主、驸马及皇子妇,尤其是宋初皇位授受因存在“金匱之盟”“斧声烛影”等疑案,使此类以孙为子之举更具政治敏感性。

开宝九年十月,太祖崩,太宗赵光义自晋王、开封尹继位。十一月初,太宗下“诏齐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4]384},与太宗在太祖朝所享之待遇相同。但随着太平兴国四年太宗亲征辽国燕京惨败而归,致使“金匱之盟”后遗症渐次爆发。史载“德昭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或有谋立王(德昭)者,会知上处,乃止。上微闻其事,不悦”^{[4]460}。及班师归京,太宗因“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议者皆谓不可,于是德昭乘间入言,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4]460}。德昭惶恐,遂自刎而死。至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三月,德芳“卒,年二十三”^{[4]490}。因德昭为“金匱之盟”中人,而德芳于太祖驾崩时,“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4]380}德芳入宫,但王继恩却“径趋开封府召晋王”^{[4]380},赵光义遂得以抢先入宫继位。鉴于“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3]8669},于是太宗旧僚心腹柴禹锡等“告廷美阴谋”,太宗随即起用元老重臣赵普,于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再拜宰相,“于是廷美遂得罪”^{[3]8669},太平兴国七年三月罢去廷美开封尹,改授西京留守^⑭。廷美与宰相卢多逊交往密切,明清之际学者王夫之尝议论道:“金匱”约盟传位,“杜后之命非正也,卢多逊守太后之命,始之欲全太宗于太祖之世,继之欲全秦王(廷美)于太宗之世”^[8],故赵普遂“廉得多逊与秦王廷美交通事”^{[4]516},太宗即重贬卢多逊,“并家属流崖州;廷美勒归私第”^{[4]517},并“诏索

王廷美男女等宜正名呼”^{[4]518}，于是廷美子“贵州防御使德恭等仍为皇侄，女婿韩氏妇去云阳公主之号”^{[4]518}，女婿韩崇业去驸马都尉之号，“并发遣往西京，就廷美安泊”^{[4]518}；不久又以“廷美不悔过怨望”^{[4]520}的罪名，降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4]520}。仅过了一年半，廷美即于雍熙元年（984年）初“忧悸成疾”^{[4]572}而卒于贬所房州。

廷美遭贬之后，太宗着意培植自己诸子，如太平兴国七年七月，“封皇长子德崇（元佐）为卫王，第二子德明（元佑）为广平郡王”^{[4]523}，并同平章事，“分日”赴“中书视事”^{[4]524}。至次年十月，太宗进封诸子官爵，“元佐进封楚王、元佑进封陈王、元休封韩王、元隼封冀王、元杰封益王”^{[4]555}，并加同平章事；十一月，“楚王元佐等五王同日赴中书视事”^{[4]557}。太宗为己子改名，乃使诸子之名的排行字与太祖、廷美之子有所区别，“以别大统”^⑤，但太祖之女仍被视作皇女，称公主^⑥。

在太宗封其五子为王爵之前数日，太宗诏命其诸子名之“德”字改为“元”字，以与太祖、廷美之子相区别；并将“皇侄孙德雍改名惟吉”，因太宗继位后，德雍“犹居禁中，于是出阁，始改名焉”。据上文所引《宋会要辑稿·帝系》，德雍至“端拱元年二月，改今名”惟吉，《长编》云此时改名者不确。此外，惟吉此时出阁，也不合当时常例。据考宋初诸王出阁年龄，德昭于乾德二年六月出阁，德芳于开宝八年（975年）七月出阁，太宗子元佐、元佑皆“太平兴国七年七月出阁”^{[5]40}，皆“时年十七”^⑦。又廷美长子德恭“太平兴国四年，以皇子出阁”^{[3]8671}，时年十八岁^⑧。而太平兴国八年惟吉出阁时，年仅十三岁，可见其出阁年龄并不合常例。可能为减弱其影响，太宗也命其子元俊（原名德严，此后又改名元份）、元杰（原名德和）皆于太平兴国八年出阁，“拜同平章事”^{[3]8699}，封王爵。此时元俊年十五岁^⑨、元杰仅十二岁^⑩。又太宗子元偃生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天禧二年（1018年）薨，年四十二，则其端拱元年出阁时年十二岁；元偃甚至“七岁授检校太保、泾国公”^{[3]8704}。

太宗通过改名以区别己子与太祖、廷美诸子，由此昭示其“传子”意图，此事似乎还与赵普有关。赵普于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复拜首相，乃是太宗欲倚重赵普以“勋旧”身份出面处置秦王

廷美、宰相卢多逊，“于是普复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则普之为也”^{[4]501}。“及涪陵事败，多逊南迁，皆普之力也。”^{[3]8934}至太平兴国八年十月戊戌，太宗始将自己诸子之名由“德”字改为“元”字；十月己酉，于进封元佐等五子王爵，“并加同平章事”之同日，已完成使命的赵普被免去宰相，“罢为武胜节度使”^{[4]555}。太宗宣告之理由是赵普“今齿发衰矣，不容烦以枢务，择善地处之，因诗什以导意”^{[3]8934}，而赵普因此“感激泣下”，甚至表示要将天子赐诗“刻石，与臣朽骨同葬泉下”^{[3]8934}。

虽然太宗至此传子之意已昭示天下，然其传子过程却颇为不顺，“初，涪王廷美既得罪，楚王元佐独申救之，上不听。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4]597}。《司马光日记》引宋敏求云“廷美之贬，元佐请其罪，由是失爱”^{[4]597-598}，李焘以为“《日记》盖得其实也”^{[4]598}。至雍熙元年九月，元佐因事“发愤”而“纵火焚宫”^{[4]598}，太宗大怒，废元佐为庶人，幽居于南宫。于是太宗属意次子元偃（元佑），于雍熙三年（986年）十月授开封尹^⑪。为稳固元偃地位，太宗又于端拱元年二月庚子，因元偃之请，以“欲相吕蒙正，以其新进，借普旧德为之表率”^{[3]8938}为由，又拜赵普为宰相。同月，为“太祖甚爱之，视如己子”，“幼养宫中……与诸叔联名”的德昭之子德雍遂改名惟吉，正式宣示惟吉身份由原本一视同仁之“皇子”改为皇侄孙。

苏辙《龙川别志》尝载“楚王元佐，太宗之长子，将立为嗣，坚辞不肯，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废，故当时以为狂，而实非狂也”^[9]。李焘对此辨曰：“按太祖二子，德昭卒于太平兴国四年八月，德芳卒于六年三月，而元佐以七年七月出阁，时太祖之子无在者矣。元佐虽封卫王，盖未尝有建储之议也。九年正月，廷美死，元佐乃发狂，固无缘辞位，《别志》误矣。”^{[4]597}确实，宋朝官史记载太祖生有四子，德昭、德芳之外二子夭折。但北宋前期士大夫间却又有“太祖八子”“太祖遗腹子”之类传言流布。

司马光《涑水记闻》引杨乐道云：“苏王元偃，太祖遗腹子，太宗子养之。”^[10]郑獬《郟溪集·南康郡王墓志铭》称“太祖皇帝有八子，讳德昭者为越懿王”^[11]。据《文献通考·帝系考》载太祖四子，贺皇后生留哥、魏王德昭、显哥三子，王皇

后生德芳一子；太宗九子，“李皇后生楚王元佐及真宗。其昭成太子元僖、陈王元份、安王元杰、密王元偓、曹王元偁、镇王元俨、代国公元亿，史不详其母氏”^[12]。《宋史·后妃传》载太祖贺皇后生“秦国、晋国二公主，魏王德昭”^{[3]8607}，王皇后“生子女三人，皆夭”^②；《宋史·宗室传》载“太祖四子，长滕王德秀，次燕懿王德昭，次舒王德林，次秦康惠王德芳。德秀、德林皆早亡，徽宗时，追赐名及王封”^{[3]8676}。则留哥、显哥当为德秀、德林之乳名，因“早亡”，故《宋史·后妃传》未予记载。又《宋史·公主传》称“太祖六女”，其中三位公主“皆早亡”^{[3]8772}。因《宋史·后妃传》等文献所载皆称太祖三位皇后，而未见其他嫔妃，此并非太祖于三位皇后以外别无嫔妃，实属史籍失载而已。且据《宋史·宗室传》所载，镇王元偓于天禧二年“暴中风眩薨，年四十二”^{[3]8703}。故推知元偓实生于太平兴国二年，正在太祖猝死、太宗即位之次年。由此，时人遂有元偓乃“太祖遗腹子”之说。

至于“太祖八子”之说，似也不当简单视之为无稽之谈。如上文所引《宋史》等云，太祖生有四子六女，其中贺皇后生育三子二女，王皇后生育一子二女，另外二女未详其母为谁。而郑獬乃仁宗朝进士第一人及第，神宗初拜翰林学士。南康郡王世永为德昭曾孙，《南康郡王墓志铭》乃郑獬在翰林学士任上奉敕所撰，且也无证据云其“太祖皇帝有八子”数字存在手民之误。由此，或于太祖“遗腹子”“以孙为子”之外，可能尚有二子为其他嫔妃所生，因幼年夭折，而未为史籍所载录。但在惟吉尚未由“皇子”改为皇侄孙之时，李焘因德昭、德芳已卒，遂称“时太祖之子无在者矣”，似并不确。此乃因宋初皇位授受之际有“金匱之盟”“烛影斧声”诸疑案，故关涉其人、其事者如王皇后及德芳、德昭、惟吉诸人的事迹记载多有缺失舛误^③。因此，苏辙《龙川别志》载元佐至此“欲立太祖之子”，恐也不当简单视作无稽之谈。

元僖任开封尹五年，“政事无失，上尤所钟爱”^{[4]741}，不料却于淳化三年（992年）十一月，因饮食中毒而猝死。太宗于是只得转而培养第三子赵元侃，于淳化五年（994年）九月以“元侃为开封尹”^{[4]797}；至道元年（995年）八月“制以开封

尹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恒”^{[4]818}。“自唐天祐以来，中国多故。不遑立储贰，斯礼之废，将及百年，上始举而行之，中外胥悦。”^{[4]818}至道三年三月太宗驾崩，赵恒继位，是为真宗。太宗传子之计划终得实现，但其间史籍记载仍颇有缺失。

其一，《长编》载雍熙元年十二月，“立德妃李氏为皇后”^{[4]590}。李焘注曰：“后以太平兴国二年七月入宫，至是立为皇后。诏词但云陇西李氏，则未始封德妃也。按本传及《会要》等亦不载德妃之号，不知《本纪》何故云尔。当考。”^{[4]590}据《宋史·后妃传》，太宗诸皇后，其淑德尹皇后，“滁州刺史廷勋之女，兄崇珂保信军节度。太宗在周时娶焉，早薨。及帝即位，诏追册为皇后”^{[3]8609}。懿德符皇后，“魏王彦卿第六女也，周显德中归太宗”^{[3]8609}，于“开宝八年薨，年三十四。……帝即位，追册为皇后”^{[3]8609}。而明德李皇后，“淄州刺史处耘第二女，开宝中，太祖为太宗聘为妃，既纳币，会太祖崩，至太平兴国三年始入宫，年十九。雍熙元年十二月，诏立为皇后”^{[3]8610}。《长编》卷十七也载开宝九年十一月，“追册故尹氏为淑德皇后，越国夫人符氏为懿德皇后。尹氏，崇珂之女儿，上微时娶焉”^{[4]383-384}。太宗于开宝九年十月即位，至雍熙元年末方册立李氏为皇后，如此则太宗虚位中宫竟然长达九年之久，史上少见，但其原因史文无载。或者是年改元雍熙、册立皇后，皆与年初廷美之死有关涉^④。

其二，至道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孝章皇后宋氏崩”^{[5]682}。至八月壬辰，太宗即立第三子开封尹元侃为皇太子。按五代宋初惯例，亲王尹京便隐然为“皇储”之位。如南宋陆游所指出：“雍熙二年，始以陈王元僖为开封尹，盖是时太宗元子楚王元佐被疾废，则陈王亦储君也。淳化三年薨。后二年，真宗皇帝自襄王为开封尹，至道元年正东宫。……自后唐以来，虽以尹京阴为储副之位，然皆藩王。”^[13]王铨也云：“太宗长子楚王元佐既病废，次即昭成太子元僖封许王，最所钟爱，尹开封府，择吕端、张去华、陈载一时名臣为之佐。礼数优隆，诸王莫比。将有青宫之立。”^[14]但同时太宗又不欲正式确立“皇储”，对上书请立皇太子的官员痛加贬斥：

于是左正言、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阁上书，请立许王元僖为皇太子，词意狂

率，上怒甚，将加窜殛，以惩躁妄。而沆又宰相吕蒙正之妻族，蒙正所擢用，（淳化二年九月）己亥，制词责蒙正以援引亲昵，窃禄偷安，罢为吏部尚书。^{[4]720}

《宋史·冯拯传》亦载：“淳化中，有上封请立皇太子者，拯与黄裳、王世则、洪湛伏阁请立许王元僖，太宗怒，悉贬岭外。”^{[3]9608}太宗怀疑此事乃由吕蒙正暗中操纵，故于“怒甚”之余，将一向甚为信用的吕蒙正罢相。太宗如此反感臣下请册立皇太子的原因，据其对近臣所言：

屡有人言储贰事，朕颇读书，见前代治乱，岂不在心！且近世浇薄，若建立太子，则官僚皆须称臣。官僚职次与上台等，人情之间，深所不安。盖诸子冲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属，悉择良善之士，至于台隶辈，朕亦自拣选，不令奸险巧佞在其左右。读书听书，咸有课程，待其长成，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谅此心耶？^{[4]720}

但此时元僖年已二十六岁，故所谓“诸子冲幼，未有成人之性”云云，显属借口而已。其背后原因除“若建立太子，则官僚皆须称臣。官僚职次与上台等，人情之间，深所不安”，即担忧若建太子，将威胁其权位，如册立第三子元侃为皇太子之后，太宗尝有“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4]818}的牢骚之外，似还别有不可为外人言的隐衷在。

史载太宗因所钟爱并寄予厚望的长子、次子一废一死而深受打击，故臣下皆不敢再上言建立“嗣君”之事，直至淳化末方有“敢言外事”的王得一和以敢言任事闻名的寇准论及此事。河南人王得一“以方技进”，授崇仪副使，淳化五年九月解官。“得一尝入对禁中，或至夜分，颇敢言外事，又潜述人望，请立襄王为皇太子焉。”^{[4]797}约于此前后，知青州寇准被召入京，太宗“屏左右”咨询可嗣位者：“襄王可乎？”寇准答：“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3]9528}太宗遂“用寇准之言也”^{[4]797}，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但直至次年四月末宋皇后崩，早有传子之意的太宗随即于八月中举行已废近百年的册皇太子礼。因此，此举当如上文所述者，太宗即位九年未册立皇后，却于廷美身死之当年即“立德妃李氏为皇后”一样，当非巧合，其间可能宋皇后的存在，即是太宗迟迟未能举行册皇太

子礼的重大妨碍。

因此，“太祖甚爱之，视如己子”的德昭次年年仅十三岁即出阁，端拱元年改德雍名为惟吉，也当出于太宗为顺利传子之考虑，即恢复惟吉为太祖之孙辈的身份，从而彻底消除其将来“嗣位”之可能。

三、王继恩等“谋立太祖之孙惟吉”传言辨析

太宗虽经多年谋划经营，如愿传子，但其余波犹时常激荡于皇室乃至社会舆论中。北宋时，有关太祖子孙虽“失位”，但“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说法颇在民间流传。据南宋王明清《挥麈录余话》云：

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监苗昌裔往相地西洛。既覆土，昌裔引董役内侍王继恩登山巅，周览形势，谓继恩云：“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继恩默识之。太宗大渐，继恩乃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枢密赵镗、知制诰胡旦、布衣潘阅谋立太祖之孙惟吉，适泄其机，吕正惠（端）时为上宰，锁继恩，而迎真宗于南衙，即帝位。继恩等寻悉诛窜。前人已尝记之。熙宁中，昌龄之孙逢登进士第，以能赋擅名一时。……逢素闻其家语，与方士李士宁、医官刘育荧惑宗室世居，共谋不轨，旋皆败死。详见《国史》。靖康末，赵子崧守陈州。子崧先在邸中剽窃此说，至是适天下大乱，二圣北狩，与门人傅亮等歃血为盟，以幸非常，传檄有云：“艺祖造邦千龄，而符景运，皇天祐宋六叶，而生眇躬。”继知高宗已济大河，惶惧归命，遣其妻弟陈良翰奉表劝进，高宗罗致元帅幕。中兴后，亟欲大用。会与大将辛道宗争功，道宗得其文缴进之，诏置狱京口，究治得情。高宗震怒，然不欲暴其事，以它罪窜子崧于岭外。^[15]

虽说“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语，是否确为苗昌裔所预言，颇存疑问。但是赵世居、赵子崧皆属太祖后裔，其二人被杀、被贬，确与其闻知此传说而心生异心有关^⑤。不过王明清称当时王继恩、李昌龄等“谋立太祖之孙惟吉”，却颇有误。

太宗立皇太子以后，为确保皇位授受顺利，

进行了周密安排。但即便如此,真宗继位仍危机四伏。据《长编》载:

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继恩忌上(真宗)英明,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谋立楚王元佐,颇间上。……及太宗崩,继恩白后(李皇后)至中书召(宰相吕)端议所立。端前知其谋,即给继恩,使入书阁检太宗先赐墨诏,遂锁之,亟入宫。后谓曰:“宫车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议!”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4]862}

李焘注云:“王继恩等谋废立,《实录》《国史》绝不见其事迹,盖若有所隐讳。今据《吕海集·正惠公补传》及司马光《记闻》增修,《补传》所载,比之《记闻》尤详也。”^{[4]862-863}《长编》又载:

太宗之即位也,继恩有力焉,太宗以为忠,自是宠遇莫比。继恩喜结党,邀名誉,乘间或敢言事,荐外朝臣,故士大夫之轻薄好进者辄与往来,每以多宝僧舍为期。潘阆得官,亦继恩所荐也。阆者,倾险士,尝说继恩乘间劝太宗立储贰,为它日计,且言:“南衙自谓当立,立之,将不德我。即议所立,宜立诸王之不当立者。”南衙,谓上也。继恩入其说,颇惑太宗,太宗谕立上,阆寻坐狂妄絀。太宗疾革,继恩与昌龄及旦更起邪谋,吕端觉之,谋不得逞。上既即位,加恩百官,继恩又密托旦为褒辞。旦已先坐絀,于是并逐三人者。诏以继恩潜怀凶慝,与昌龄等交通请托,漏泄宫禁语言也。^{[4]865-866}

李焘又注曰:

李昌龄、王继恩、胡旦三人同窜责,《实录》及《国史》并不明著罪状,但具录甲戌诏书,盖当时有所讳避,不得不然。诏称昌龄恣行请托,深乱朝纲,继恩潜怀凶慝,附下罔上,结党朋奸,则亦可略见其不轨心迹,故仍掇取诏书以见当时行事。潘阆纳说继恩,此据《倦游杂录》稍删润之。《湘山野录》及《笔谈》载阆与卢多逊同谋立秦王,盖误以继恩为多逊,楚王为秦王,传闻不审也。^{[4]866}

据李焘注文可知,北宋官私史籍所记真宗继位始末颇为混乱,但李焘“删润”处也颇有“讳

避”:如其一,“忌上(真宗)英明”而“密谋”者,不仅为王继恩诸人,据《涑水记闻》载,还有李太后(李皇后)、李太后之弟殿前都指挥使李继隆^⑤。其二,《长编》所云潘阆“尝说(王)继恩乘间劝太宗立储贰,为它日计……继恩入其说,颇惑太宗,太宗谕立上(真宗),阆寻坐狂妄絀”。据史载布衣潘阆赐进士及第在至道元年四月丙申,“未几,追还诏书,以阆所为狂妄故也”^{[4]812},其时即在太宗册立皇太子前后。此可证李皇后与王继恩等似早已有异谋。陈师道《后山谈丛》又云:“太宗不豫,吕正惠公宿西省,内侍都知王某夜叩省门,以丧讣告,且问所立。于时长子楚王以疾废,真宗次为太子,诸子王者五人。公曰:‘此何语,内侍欲斩邪!预立太子,正为此尔。且吾奉手诏,可取视也。’王既入,公遽合户,锁之而去。真宗既立,还而出之。”^[16]因此,李焘以为宣称“立嗣以长”的李皇后乃欲废皇太子而推立元佐嗣位,实不可能谋立德昭之子惟吉,《挥麈录余话》所云不确。不过,所谓“谋立太祖之孙惟吉”之说虽因辗转传述而有误,但却也全非出于虚构。

虽然北宋私家著述如《吕海集·正惠公补传》、司马光《涑水记闻》及陈师道《后山谈丛》等皆称王继恩等谋立楚王元佐,但宋朝诸官私史籍又皆称元佐“发狂”,“感心疾”,“屡为残忍、不守法度”^{[4]598}之事,由是“废为庶人”。据此后哲宗崩,申王“佖于诸弟为最长,有目疾不得立”^{[3]8722},遂以“端王嗣位”,是为徽宗之例,“感心疾”而被大行皇帝“废为庶人”的元佐,更不当“嗣位”君临天下,故所谓“王继恩等谋废立”之事,其当时所欲立者似非元佐。因元佐字惟吉,“初名德崇”,其长子允升“初免乳,养明德太后宫,太后亲抚视之”,真宗初继位,即“赐名元中”^{[3]8695},与诸叔父“联名”,一如太祖之孙惟吉,此后方“改今名”曰允升。故疑王明清《挥麈录余话》所云“谋立太祖之孙惟吉”,或当作“太宗之孙”,因辗转传闻而致异文。

南宋初,高宗选择宋太祖之子德芳的后裔嗣位,当也与“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传说有一定关系。故针对苗昌裔“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预言,南宋人以为孝宗之后,“光、宁、理、度皆太祖之后,昌裔之说始验。然一语不谨,既误继恩,又误昌龄辈,又误其孙逢,又误子崧诸人,

貽祸百五十余年,虽轻浅之徒妄生侥幸,亦皆昌裔之罪也”^[17]。

余 论

太祖将德昭幼子接入宫中交宋皇后抚养,其初意恐仅因宋皇后无子之故,而宋皇后亦“抚养备至,亲为栉沐”,遂“爱之”而养孙作子,并赐名德雍,而与其父、叔“联名”。但身为天子之子,其身份变化往往伴随着政治纷争。故太宗继位以后,因“金匱之盟”等影响,加上德昭、德芳及廷美先后死亡,太宗意欲传子,于是身份日渐尴尬的德雍终于被礼送出禁宫,由皇子为皇侄;此后又随着太宗传子之意日渐显明,德雍遂被改名惟吉,由皇侄复为皇侄孙,由此阻绝其嗣位之资格。

史载“神宗即位,诏以‘昔侍先帝,恭闻德音,以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辄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岂可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之序。宜诏有司革之,以厉风俗’。于是著为令。仍命陈国长公主行舅姑之礼,驸马都尉王师约更不升行。公主见舅姑行礼自此始”^{[3]2733}。此说乃出于言官贾黯的提议:“是时诏为德宁公主访婚,公见上言曰:‘国朝公主出降,皆以祖为父,以父为兄,遂废公主事舅姑之礼,臣常惜之。臣愿陛下诏诸公主下降,其有舅姑者,皆令备礼,于以厚人伦、正风俗,无大于此矣。’”^[18]然英宗因疾病而崩,未及颁行,故神宗至此特下诏革除“旧制”,“以厉风俗”。但检史籍,在北宋前期,因尚公主而升行的驸马都尉仅有三例,即柴宗庆(太宗时知枢密院事柴禹锡之孙)、王贻永(太祖时宰相王溥之孙)、李遵勳(太祖时枢密使李崇矩之孙),皆于真宗时分别选尚太宗三女儿鲁国长公主、郑国长公主、随国长公主,为驸马都尉,皆升行“以祖为父”,其主要目的在于调整婚姻双方家庭的辈分关系,即柴禹锡、王溥、李崇矩与太祖、太宗兄弟虽属君臣,但行辈则同,太宗三女下嫁三人之孙,为维护皇家尊贵地位,自然只能提升驸马行辈,遂形成“以祖为父”“以父为兄”的局面^②。至于“公主见舅姑行礼自此始”云云,实有不然。因升行驸马虽以父为兄,但同时又以祖为父,公主下嫁仍需“见舅姑行

礼”。如太宗女鲁国长公主下嫁柴宗庆,“赐第普宁坊。宗庆,禹锡之孙,帝(真宗)命主以妇礼谒禹锡第”^{[3]8773}。又随国长公主下嫁李遵勳,时李崇矩已卒,而“遵勳父继昌亡恙,主因继昌生日以舅礼谒之。帝(真宗)闻,密以兼衣、宝带、器币助其为寿”^{[3]8774}。甚至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仁宗女韩国大长公主下嫁钱景臻,时“中书言:‘治平四年二月,诏陈国公主降王师约不升行及行舅姑之礼。今韩国大长公主降钱景臻,其行舅姑礼,请依此。’上曰:‘大长公主,朕宫中每见必拜,虽皇太后亦叙姑嫂之仪,不可与朕诸妹等也。宜止依兗国公主出降之礼’”^{[4]6681-6682}。显然“行舅姑之礼”并非英宗、神宗取消驸马升行的主要原因。

神宗诏书中所云兗国公主,即仁宗长女,因仁宗“念章懿太后(仁宗生母李宸妃)不及享天下养,故择其兄子李玮使尚主”^③,然夫妻因“不复协”而判离婚,一时大起风波;“久之,复召玮,使为驸马都尉如初”^{[3]8776},但公主终抑郁而“薨,年三十三。以玮奉主无状,贬陈州”^{[3]8777}。仁宗于庆历二年(1042年)尝下诏大宗正司言:“自今皇亲婚姻具依律令外,若父母亲姊妹及父母之亲姑为妯娌,或相与为妇姑行,而尊卑差互者,不得为婚姻。其服纪疏远而房分不同祖者,并许通嫁娶,仍不系夫之长少,各叙本族之尊卑。”^{[4]3287}但李玮实为仁宗亲舅父之子,乃属表弟,若依庆历二年诏令,李玮本不应婚娶兗国公主。此联姻乃因仁宗为报母恩而促成,却以悲剧告终,可能此即是贾黯、英宗制止皇室成员“紊乱昭穆”之行为的初衷,但因英宗以养子身份继位,实不宜由此指斥仁宗,故以“旧制”驸马“辄皆升行”,公主“以避舅姑之尊”“屈人伦长幼之序”为由,下诏制止。故而此后公主下嫁确实不再有如兗国公主和李玮之类“怨偶”,但驸马升行尚公主之事并未绝迹。如南宋理宗之女周汉国公主,景定二年(1261年)四月,理宗“以杨太后拥立功,乃选太后侄孙镇尚主”^{[3]8790}。然据《明一统志》载,杨次山以杨太后(宁宗皇后)兄累封至会稽郡王,“子谷,封新安郡王;石,封永宁郡王。谷之子蕃孙,节度使。蕃孙子镇,尚理宗女周汉公主”^[19]。又,《宋史全文》载景定二年十一月乙卯,“诏杨镇宜州观察使、驸马都尉,赐玉带。诏

杨镇父蕃孙进官二等，戚属增秩进封有差”^[20]。《景定严州续志》云“今节使蕃孙之子镇，以尚帝姬”^[21]。则杨蕃孙为杨太后侄孙，而杨镇为杨蕃孙之子，其行辈实下周汉国公主一辈，可知杨镇实属升行以尚公主，故史书中遂称其为杨太后侄孙。鉴于此，英宗、神宗制止驸马升行的用意，恐也隐含有纠正宋初“祖宗”以孙为子现象而造成的消极政治影响之考虑。因此，虽然宋代社会甚至士大夫中以孙为子现象并非罕见^⑨，但此后宋皇室内确实未再有以孙为子之事见诸史籍。

注释

①刘盼遂：《由周迄清父子之伦未全确定论》，《燕京学报》1936年总第20期。②周鼎：《西安所出两方唐代亲王墓志补释——兼论唐代皇室中的以孙为子现象》，《碑林集刊》2012年第1辑。③学界对宋代皇室中的驸马“升行”以及民间社会存在的“以孙为子”“养弟为儿”等“紊乱昭穆”事例有所研究，如孙旭：《宋代驸马升行探微》，《宋史研究论丛》2009年第1辑；周绍华：《宋代驸马升行制度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吴凌杰、俞钢：《宋代“紊乱昭穆”事例新探》，《保定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黄承炳：《北宋驸马升行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3期。但未有论及宋初皇室内“以孙为子”现象者。④⑧⑩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第23页，第39页。⑤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680页。《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二八也称惟忠“初名文起，太平兴国八年十月赐今名”。《宋史·宗室传》载惟固“本名元宸”，其“元宸”当作“文宸”，即德昭诸子之名皆曰“文”，不当仅惟固作“元”。又惟固当作“惟贞”，乃因避仁宗名讳而追改。⑥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69页。惟吉乃德昭次子，此称“长子”，误。何冠环指出：《宋史·宗室传》《宋会要辑稿·帝系》皆载德昭长子惟正，而惟吉居次。然据《宋太宗皇帝实录》多处所载，德昭长子其实是惟吉。考惟吉所授之官，由始至终都高于惟正，若惟正是兄，不当如此。又据《宋史》惟吉本传，惟吉自幼甚得太祖和宋皇后疼爱，正合太祖长孙的身份。疑《宋史》《宋会要辑稿》误记。参见何冠环：《“金匱之盟”真伪新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何文此说乃是误据《宋太宗皇帝实录》卷七六立论，故推寻惟吉官爵始终高于惟正的原因，实在于太祖尝以惟吉为子，而惟正只是孙辈的缘故。故疑此处“长子”当为“次子”之误。⑦惟吉初名德雍，然廷美第四子亦名德雍，廷美卒于雍熙元年，有十子，则德雍当出生于此前，未详德昭子、廷美子同名之缘故，或是廷美子取名曰德雍，乃在惟吉改名以

后。⑨吴凌杰、俞钢：《唐五代“以孙为子”“养弟为儿”现象初探》，《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⑩《东都事略》卷十三《世家一》也称章怀皇后潘氏乃“忠武军节度使美之第八女也”，而卷二七《潘美传》又云“惟熙女即章怀皇后也，美后追封郑王，以章怀故也”。此当因《宋史》《东都事略》之《后妃传》与《潘美传》史源有异而致。⑪姜勇：《〈焦守公墓志铭〉诸问题考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1期。⑫孙旭：《宋代驸马升行探微》，《宋史研究论丛》2009年第1辑；周绍华：《宋代驸马升行制度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⑬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14页，第624页。⑮岳珂：《愧郗录》云：“国朝宗属，本未定联名之制。艺祖友悌因心，凡宣祖本支之在子行者，皆冠‘德’字，赐名授爵，俱无等差。熙陵继序，初更用‘元’字，以别大统。”《全宋笔记》第83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第167页。⑯如《宋大诏令集》卷三六载淳化元年《郑国公主进封秦国公主制》《许国公主进封晋国公主制》《虢国公主封齐国公主制》《皇第四女蔡国公主进封魏国公主制》，据《宋史·公主传》，秦国、晋国、齐国三公主乃太祖之女，而太宗长女滕国公主“早亡”，次女即魏国公主，连太祖三女而排行第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0—191页。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六月庚戌条载：“皇子德昭为贵州防御使，时年十七。前代皇子出阁即封王，上以德昭未冠，特杀其礼，非旧典也。”《东都事略》卷十五《世家三》云德昭“太平兴国四年暴薨，年二十九”。则推知德昭乾德二年出阁时年十四岁。然《宋史·陈思让传》称其“乾德二年，又为保信军节度。时皇子兴元尹德昭纳思让女为夫人”。若年十四岁即娶妇，似乎过早。疑《东都事略》云“年二十九”者有误。《宋史·宗室传一》载，德芳卒于太平兴国六年，“年二十三”，则其开宝八年七月出阁时亦十七岁。然《宋史·宗室传一》载德芳“开宝九年出阁”者，误。又据《宋史·宗室传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淳化三年十一月己亥条，元佐卒于天圣五年，年六十二，元佑卒于淳化三年，年二十七，则推知二人于“太平兴国七年七月出阁”时皆十七岁。⑱德恭卒于真宗景德三年五月，“年四十五”，故其出阁时年十八岁。⑲《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三〇云元份卒于景德二年，《宋史·宗室传》云其“薨年三十七”，则其太平兴国八年时十五岁。⑳《宋史·宗室传》云元杰于咸平“六年七月暴薨，年三十二”，则其太平兴国八年时仅十二岁。㉑《宋史·后妃传》称王皇后“生子女三人，皆夭”者误，王皇后实生德芳，见顾宏义：《赵德芳生母考——兼析宋朝官史失载赵德芳生母之原因》，《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㉒顾宏义：《赵德芳生母考——兼析宋朝官史失载赵德芳生母之原因》，《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㉓据《宋史·太宗本纪》载，太

平兴国九年正月“丁卯，涪陵县公廷美薨，追封涪陵王”。四月“乙酉，泰山父老诣阙请封禅。戊子，群臣表请凡三上，许之”。六月“壬寅，诏罢封泰山”。十一月“丁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雍熙。至十二月，又册立李皇后。^⑤李裕民：《宋神宗制造的一桩大冤案——赵世居案剖析》，载《宋史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6页。^⑥《涑水记闻》卷六云：“太宗疾大渐，李太后与宣政使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谋立潞王元佐。”检《宋史·李继勋传》，李继勋死于太宗太平兴国初，不可能参与王继恩密谋。而《宋史·李继隆传》云李继隆于端拱初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保顺节度，至道二年统军西北与党项作战，“真宗即位，改领镇安军节度、检校太傅。逾月召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解兵柄归本镇”。镇安军即陈州，《宋史·雷孝先传》即有“李继隆判陈州”之语。可证“李继勋”当为“李继隆”之误。^⑦孙旭：《宋代驸马升行探微》，《宋史研究论丛》2009年第1辑；周绍华：《宋代驸马升行制度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据《宋史·公主传》，真宗二女，长女“早亡”，次女“初入道”；仁宗长女嘉祐中嫁李玮，其余诸女皆于神宗朝下嫁。^⑧“其兄子李玮”之“兄”，当作“弟”。^⑨如《宋史·孙永传》云孙永“年十岁而孤，祖给事中冲列为子行，荫将作监主簿。……冲卒，丧除，复列为孙”。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3624.
[2] 刘昫, 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4045.
[3] 脱脱, 等.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4]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5] 徐松. 宋会要辑稿[M]. 刘琳, 刁忠民, 舒大刚, 等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6] 李心传. 旧闻证误[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7] 钱若水. 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M]. 范学辉,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8] 王夫之. 宋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32.
[9] 苏辙. 龙川别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71.
[10] 司马光. 涑水记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36.
[11] 郑獬. 郟溪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097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294.
[12]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6981.
[13]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 第223册[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146.
[14] 王铨. 默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6.
[15] 王明清. 挥麈录余话[M]//全宋笔记: 第57册.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9: 288.
[16] 陈师道. 后山谈丛[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65-66.
[17] 俞德邻. 佩韦斋辑闻[M]//全宋笔记: 第99册.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9: 296.
[18] 刘攽. 彭城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096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338.
[19] 李贤. 明一统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472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072.
[20] 宋史全文[M]. 汪圣铎,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2907.
[21] 方仁荣, 郑瑄. 景定严州续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487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550.

Study of “Treating His Grandson as His Own Son” of Emperor Taizu of Song —An Analysis of the Rumor of the “Plot to Make Emperor Song Taizu’s Grandson, Zhao Weiji the Emperor” from Wang Jien and Others

Gu Hongyi

Abstract: Emperor Taizu of Song once brought his young grandson (the son of Zhao Dezhao) into the palace to be raised, treating the grandson as his own child and renaming him Zhao Deyong. This name was similar to his father’s and uncle’s. Emperor Taizong is also believed to have engaged in similar practices. This act of raising royal children in the palace seems to have originated from childless Empress Song of Emperor Taizu and Empress Li of Emperor Song Taizong. However, this practice of “disrupting the generational hierarchy” subtly affected the succession of the throne during the early Song Dynasty. Consequently, Emperor Taizong later changed Zhao Deyong’s name to Zhao Weiji, restoring his status as a grandnephew of the emperor. When Emperor Taizong passed away, officials such as Wang Jien attempted but failed to prevent Emperor Zhenzong from ascending to the throne. Following this, rumors spread that they had intended to “elevate Zhao Weiji, the grandson of Emperor Taizu to the throne”. These rumors, whether explicit or implicit, influenced subsequent events, including separate disturbances among the royal family during Emperor Shenzong’s reign and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They also affected Emperor Gaozong’s decision to choose a descendant of Emperor Taizu as his successor.

Key words: Emperor Taizu of Song; treating his grandson as his son; Wang Jien; Zhao Weiji

[责任编辑/晨 潇]